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6.04.006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胡海晨,李晨月,赵瑞彤,林巧华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不仅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促进国有企业与外部经济主体协作,还能通过数据赋能增强国有企业内部发展能力,进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城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从经济效益、社会责任、战略使命3个维度测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沪深A股上市国企2010—2024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对履行社会责任和承担战略使命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不显著;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促进“外部协同”(供应链优化,具体表现为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和供应链效率提升)和“内部提升”(增强动态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数据开放质量提升能够增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市场竞争较大地区、东部地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应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持续提升数据开放质量,并完善国有企业数据治理体系,有效促进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政府公共数据;数据开放平台;供应链效率;供应链配置;动态能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6.1;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6)04-0071-16

引用格式:胡海晨,李晨月,赵瑞彤,等.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西部论坛,2026,36(4):71-86.

Hu Haichen, Li Chenyue, Zhao Ruitong, et al.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West Forum, 2026, 36(4): 71-86.

* 收稿日期:2026-01-31;修回日期:2026-06-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GL1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63029);石河子大学人文社科科研创新团队项目(XGTD202501)

作者简介:胡海晨(1975),男,四川南充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新与企业转型升级、企业数字化发展研究。李晨月(2001),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转型研究。赵瑞彤(1996),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研究。林巧华(1996),女,福建福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化转型研究。

一、引言

作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需在全球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承担起以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使命(何瑛等,2024)^[1]。受双重代理问题、政策性负担以及激励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效率与核心竞争力提升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何威风等,2017)^[2],存在技术路径依赖、资源配置固化以及管理层认知不足等问题(黄速建等,2018;肖红军,2020)^[3-4]。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如何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加快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探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文献大量涌现,但其中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

关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现有实证文献主要从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展开。在内部治理维度,基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相关文献考察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陈艳利等,2023)^[5]、产权权利束分割(马新啸等,2025)^[6]、高管限薪方式(吴秋生等,2025)^[7]等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外部环境维度,相关研究主要基于营商环境(陈西婵等,2025)^[8]、具体政策(杨兴全等,2025)^[9]以及外部监督(王建新等,2022)^[10]等,探究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信息环境、强化外部治理等渠道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总体而言,既有文献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影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但对具有普惠性与公共性特征的政府行为的影响关注相对不足。事实上,国有企业兼具经济与政治属性,其发展过程深度嵌入政府治理体系,政府行为是影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不断推进,政府在数据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以公共数据开放为代表的政府数字治理,正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一种具有普惠性、非针对性与公共性的政府治理行为(杨壮等,2025)^[11],依托数据开放平台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均等化的数据要素供给,有助于打破数据壁垒、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彭远怀,2023)^[12],进而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近年来,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后果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不仅有效改善了宏观经济运行(方锦程等,2023;郭家堂等,2025)^[13-14],还显著促进了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马永军和黄睿轩(2024)^[15]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了企业发展质量;胡海洋(2025)^[16]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缓解信息摩擦和提升企业能力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李恩极等(2025)^[17]研究认为,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数据获取门槛(夯实数据资源基础)、驱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能力)、稳定市场预期(优化制度环境)等机制协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刘艳等(2026)^[18]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高经营能力、营运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然而,已有文献大多将上市公司整体(或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较少针对国有企业进行专门分析,而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使其受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影响与其他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同时,尽管相关研究在异质性分析中往往会对国有企业子样本进行检验,但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侧重于经济效益维度(如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全面反映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鉴于上述,本文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效益、社会责任、战略使命3个维度刻画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探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上市国企2010—202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第一,基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从经济效益、社会责任、战略使命3个维度构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内涵,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参考;第二,探讨和验证了政府公共数据

开放通过“外部协同”(优化供应链)和“内部提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有助于深入认识公共数据赋能企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三,进一步从数据开放质量、市场竞争程度、数字化转型水平、地理区位等方面考察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为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公共数据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路径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组织混合性视角,国有企业的运行同时受市场、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必须在资本保值增值、保障民生与就业、服务国家战略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何瑛等,2024)^[1]。因此,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只是单一经济维度的增长,而是包括经济效益增长、社会责任履行、战略使命承担的全面发展,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为国有企业履行多重使命提供了关键支撑。

在经济效益维度,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数据获取成本、提高数据信息质量,为国有企业提升经济效益注入持续动力。公共数据开放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国有企业把握市场趋势、降低市场风险。同时,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强、政策响应迅速、资源禀赋基础好等优势,能够更好地获取与整合宏观经济、产业规划、科技创新等高价值公共数据(马永军等,2024)^[15],并更有效地利用公共数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塑造市场竞争优势,实现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在社会责任维度,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强化信息披露与外部监管,驱动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基于实时、标准的公共数据,国有企业能够精准把握社会需求变化,合理定位自身功能角色,优化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服务布局,进而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黄速建等,2018)^[3]。比如,利用环境监测、能耗统计、碳排放、生态保护等公共数据,国有企业能精准地识别环境风险,优化绿色生产与低碳运营决策(郭家堂,2025)^[14],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同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拓宽了信息公开范围与外部监督渠道,增强了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管效能,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压力,从而倒逼国有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王生年等,2025)^[19]。

在战略使命维度,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为国有企业提升与政府合作质量、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使国有企业能更精准把握国家战略意图、产业政策导向、区域发展布局与重大战略需求,不仅能减少国有企业的盲目投资和资源错配(彭远怀,2023)^[12],还有助于国有企业将战略性资源集中配置于推动国家战略实施的关键领域(叶永卫等,2025)^[20]。同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为国有企业与政府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战略领域的协作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合作基础(黄先海等,2023)^[21],不仅能催生出基于数据共享的新型政企合作模式,更会推动形成国家治理新格局。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不仅能通过优化发展环境改善国有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还能通过数据赋能增强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进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国有企业肩负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国家战略使命(何瑛等,2024)^[1],但其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长期面临信息获取成本高、跨区域验证难等现实困境,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打破了信息壁垒,降低了国有企业信息收集

与验证成本(方锦程等,2023;Zhao,2025)^{[13][22]},有助于国有企业优化供应链资源配置、改善供应链关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较强、决策链条较长、市场化激励不足,动态能力发展面临较大的约束,而公共数据与其生产经营的适配性较强(王生年等,2025)^[19],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为其动态能力提升提供信息基础与关键支撑(方锦程等,2023)^[13]。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供应链优化和动态能力提升两个方面探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2.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供应链优化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供应链安全稳定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构建制度化的高质量信息供给机制,将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并推动其与经济主体的内部数据整合,为国有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一方面,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整合并提供工商信息、信用评级、技术专利、区域产业集群等公共数据降低信息收集与验证成本,有助于国有企业突破地域和行业信息壁垒,实现供应链配置在地域分布、技术来源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多元化,进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能力(杨壮等,2025;Zhao,2025)^{[11][22]}。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利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提供的宏观经济、行业产销、物流运行、自然灾害预警等公共数据,能提升决策的准确性与协调性,更精准地管理库存规模、生产计划与运输路径,减少库存积压与资源错配(Liao et al.,2025)^[23],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和资金占用水平,提高供应链效率。

供应链作为联接上下游企业的核心纽带(曾增等,2023)^[24],其多元化配置和效率提升为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在经济效益维度,更加多元、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能帮助国有企业降低采购成本、优化生产安排,并保障生产稳定(巫强等,2023)^[25],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还有助于增强国有企业抵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使其在市场波动或供应冲击中发挥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李晓梅等,2025)^[26]。在社会责任维度,多元化的供应链有助于国有企业与更多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与就业稳定;供应链效率的提升使国有企业能更加高效地组织生产服务活动,从而更及时稳定地保障关键民生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陶锋等,2023)^[27]。在战略使命维度,构建自主可控且抗风险能力强的供应链体系,是国有企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和技术自主的关键,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战略物资的供给保障能力、避免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还能强化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组织与引领作用,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2: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优化供应链(供应链多元化配置、供应链效率提升)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动态能力提升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公共数据资源本身不能产生额外价值(张倩肖等,2023)^[28],其能否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并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对其进行有效识取与配用,即依赖于企业的动态能力(张倩肖等,2011)^[29]。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为国有企业动态能力的重塑与提升提供了关键支撑。动态能力主要由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构成(杨林等,2020)^[30]。首先,政府公共数据涵盖市场动态、国家发展战略、公共治理需求和区域发展规划等重要信息,国有企业将这些公共数据与自身经营数据、产业链数据进行系统整合,能更有效地识别国家战略导向、产业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公共需求变化,从而提升对外部信息的吸收能力。其次,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拓展了国有企业的数据来源,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数据资源优化与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其对政策不确定性、市场波动、技术更新等的适应能力。最后,政府公共

数据开放不仅为国有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也拓展了其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进行协同创新的空间(谢佳松等,2025)^[31]。更关键的是,政府公共数据蕴含的国家战略规划与社会需求信息为国有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方向指引,有助于降低创新风险,并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动态能力是国有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也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在经济效益维度,动态能力的强化通过优化数据治理、培育数字化人才、重构业务流程等提升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战略应变能力(焦豪等,2021)^[32],并通过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同时,动态能力的增强有助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使其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市场机遇,并将技术成果高效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增长(邵云飞等,2024)^[33]。在社会责任维度,动态能力的提升使国有企业能精准识别并内化社会发展趋势与公共利益需求,主动将社会责任融入战略决策与日常经营,并在履责过程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推动可持续发展(黄速建等,2018;邢小强等,2021)^{[3][34]}。在战略使命维度,动态能力的提升使国有企业能敏锐识别国际环境变化、产业链发展趋势及经济安全风险,从而及时调整资源配置和组织结构以适应国家战略需求与外部环境变化,并可通过前瞻性布局和持续性创新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3: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强动态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

为检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参考方锦程等(2023)^[13]的研究,以城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如式(1)所示:

$$HQD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_{it} + \gamma Controls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HQD_{it})“高质量发展”为企业 i 在 t 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DID_{it})“公共数据开放”为政策虚拟变量(企业 i 注册地城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集, μ_i 和 λ_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1)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测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单一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加值(范玉仙等,2021)^[35]、全要素生产率(胡海峰等,2024)^[36]、劳动生产率(石大千等,2019)^[37]等,虽易于计算,但难以全面反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内涵。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则存在不同的维度选择,包括“发展系统”“价值实现”“价值对象”三个维度(黄速建等,2018)^[3]、“创新”“绿色”“开放”“共享”“高效”“风险防控”六个维度(张涛,2020)^[38]、“管理与治理机制”“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效率”“产品服务质量”“财务质量”五个维度(王瑶等,2021)^[39]、“质量效益”“绿色发展”“社会共享”“创新驱动”“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六个维度(田丹等,2023)^[40]等。总的来看,现有指标体系侧重经济效益维度,兼顾社会责任维度,但忽视了战略使命维度。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创新性地从“经济效益”“社会责任”“战略使命”三个维度构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以期全面系统地评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将其扩大 100 倍作为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发展”。

表 1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经济 效益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股东权益余额
		总资产净利润率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增长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本年本期金额—营业收入上年同期金额)/(营业收入上年同期金额)
		利润总额增长率	(利润总额本年本期金额—利润总额上年同期金额)/(利润总额上年同期金额)
		投资收益率	本期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本期期末值+持有至到期投资本期期末值+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期末值+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期末值+衍生金融资产本期期末值)
	运营能力	资产负债率	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全员劳动生产率	营业收入/全体员工平均数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期末余额
	创新能力	研发人员	研发人员数量/公司员工总数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金额/营业收入
		专利数量	已获得国内专利数量
社会 责任	责任履行	ISO9001 认证	通过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披露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	披露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披露职工权益保护	披露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经第三方机构审验	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支持教育	有支持教育的行为(如创办学校,为希望工程捐款,资助贫困学生等)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带动就业	有带动就业的政策或者措施(并得到相应的执行)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财税贡献	统计年度的纳税总额
		公益事业	统计年度的捐款总额
	员工权益与 发展保障	员工培训	统计年度内发生的用于员工教育、培训等的费用金额
		志愿者活动	有杰出的志愿者活动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消费者权益 保障	售后服务	不断完善售后服务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客户满意度调查	进行了客户满意度调查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质量荣誉	产品质量方面获得认证和荣誉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环境 绩效	环境绩效	污染物排放达标	污染物排放达标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参照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ISO14001 认证	通过 ISO14001 审核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披露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披露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碳信息披露水平	碳信息词频汇总
		环境治理投资	统计年度内环保投资额总额
战略 使命	使命担当	使命担当	企业年报中出现的“使命担当”关键词的绝对词频
		政府补助	获得的政府补助与总资产之比
	政企协同	政府连接度	企业年报中同时包含“政企连接”行为关键词和机构关键词的语句的相对句频
	党的领导	党建活动	企业年报中出现的“党的领导”关键词的绝对词频

注: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 CNRDS 数据库,关键词词典及构建方法见知网附加材料。

(2)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彭远怀(2023)^[12]的研究,从企业和城市层面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层面包括“企业年龄”(对数化处理)、“企业规模”(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值)、“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人数”(对数化处理)、“独立董事占比”(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现金流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流动负债之比)、“两职合一”(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7个变量,城市层面包括“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之比)、“人口规模”(年末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值)、“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4个变量。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为2010—2024年,删除企业注册地信息缺失的样本、金融行业样本、样本期内ST/*ST/PT的样本、主要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共获得16264个观测值。城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时间通过手工搜集,并使用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2024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报告(城市)》进行验证;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企业年报;城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同时,为控制异常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高质量发展	16 264	23.986	5.979	13.568	46.198
核心解释变量	公共数据开放	16 264	0.460	0.498	0	1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16 264	3.010	0.330	1.950	3.610
	企业规模	16 264	22.806	1.456	20.090	27.020
	股权集中度	16 264	38.415	15.308	11.000	76.000
	董事会人数	16 264	2.185	0.191	1.610	2.710
	独立董事占比	16 264	37.273	5.516	31.250	57.140
	现金流比率	16 264	4.418	6.627	-15.000	23.000
	两职合一	16 264	0.114	0.317	0	1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	16 264	3.941	1.532	1.829	7.618
	人口规模	16 264	8.471	0.664	6.575	9.450
	产业结构	16 264	57.063	13.833	27.860	84.800
	经济发展水平	16 264	11.455	0.501	10.050	12.288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事前平行趋势检验与基准回归

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设,即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应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考虑到政策实施前后时间范围过长(样本期为2010—2024年),将政策窗口缩短为[-5,5],把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5年以上的汇总到上线前5年、上线后5年以上的汇总到上线后5年,并以政策实施前一期为基期,采用去均值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动

态效应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事前平行趋势要求;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后,处理组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控制组显著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政策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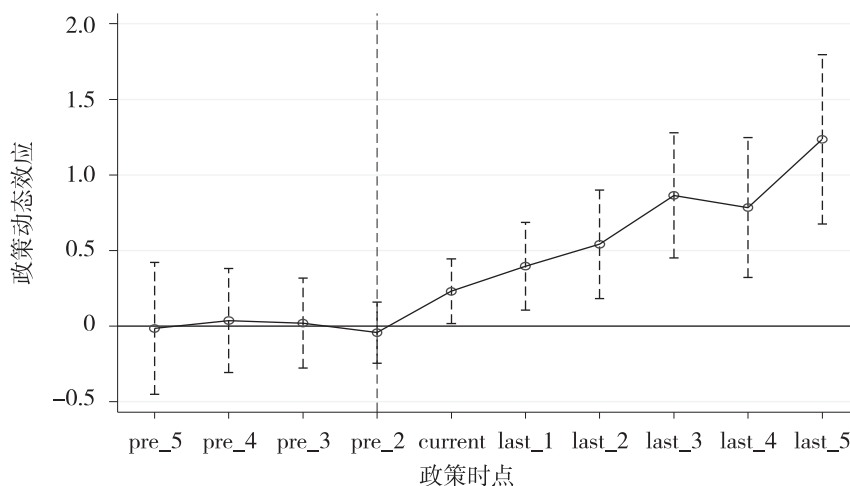


图1 动态效应分析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在逐步加入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公共数据开放”的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假说H1成立。进一步分别检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3个维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承担战略使命,但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社会责任关乎民生就业,战略使命聚焦国家战略,二者所依赖的宏观、普惠性信息(如人口流动、区域规划、产业政策等)与政府公共数据的公共属性高度契合,公共数据开放能直接为其提供有效支撑;而经济效益需要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更依赖于实时、微观、具有排他性的市场数据,政府公开数据在此方面的直接匹配度与时效性相对有限。这也说明仅从经济效益维度评价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片面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高质量发展		经济效益		社会责任	战略使命
公共数据开放	0.473*** (0.159)	0.417*** (0.152)	0.429*** (0.152)	0.128 (0.136)	1.046*** (0.380)	0.332*** (0.125)
企业年龄	6.753*** (1.154)	6.547*** (1.142)	6.378*** (1.031)		0.270 (2.367)	3.961*** (1.230)
企业规模	1.632*** (0.143)	1.634*** (0.144)	1.602*** (0.147)		-1.395*** (0.294)	0.972*** (0.126)
股权集中度	1.223 (0.815)	1.217 (0.821)	-0.639 (0.768)		-5.500*** (1.878)	1.993*** (0.728)
董事会人数	0.782 (0.541)	0.803 (0.540)	-0.536 (0.449)		-0.446 (1.228)	1.156*** (0.444)
独立董事占比	0.006 (0.015)	0.007 (0.015)	-0.025** (0.012)		-0.007 (0.035)	0.018 (0.014)
现金流比率	-1.066* (0.596)	-1.134* (0.595)	-1.394** (0.555)		-1.878 (1.700)	-0.415 (0.487)
两职合一	-0.002 (0.162)	-0.018 (0.162)	-0.365*** (0.137)		-0.054 (0.413)	0.136 (0.148)
金融发展水平		-0.322 (0.218)	0.367** (0.183)		-0.756 (0.492)	-0.423** (0.189)
人口规模		-0.378 (1.803)	0.810 (1.769)		0.322 (4.425)	-1.222 (1.581)
产业结构		-0.005 (0.012)	-0.004 (0.010)		-0.087*** (0.030)	-0.001 (0.011)

续表 3

变量	高质量发展		经济效益		社会责任	战略使命
经济发展水平		0.957 *** (0.330)		0.233 (0.305)	-0.161 (0.829)	0.794 *** (0.280)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R^2	0.699	0.716	0.717	0.764	0.385	0.74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2. 安慰剂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1) 安慰剂检验。参照王锋正和刘曦萌(2025)^[41]的做法,在固定政策冲击年份的前提下,随机抽取 1 096 家样本企业构建伪处理组,并重复 1 000 次,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伪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零值附近,分布形态近似正态,且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为显著异常值,表明基准回归得到的政策效应并非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此外,本文还采用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时间分别提前一年和两年的方法进行反事实检验,回归结果显示,虚构的政策变量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进一步表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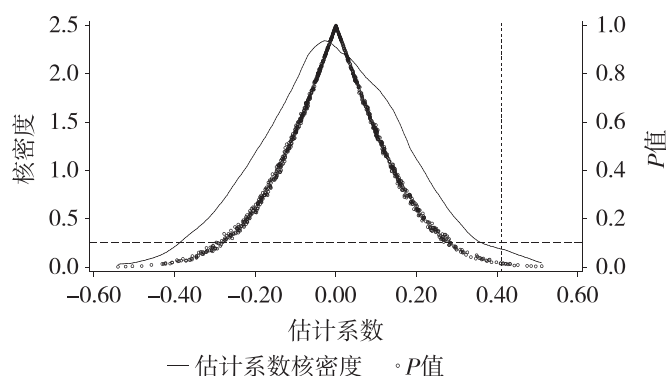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2) 工具变量法。为缓解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参考肖土盛等(2022)^[42]的研究,采用 1984 年城市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公共数据开放”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A。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正相关,且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拒绝模型不可识别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选取合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拟合的“公共数据开放”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结论依然成立。

(3) PSM-DID 检验。为缓解样本自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进行 PSM-DID 检验。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卡尺为 0.01 有放回的 1:3 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 3 种方法进行样本匹配,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明显降低。采用匹配后样本的检验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B,“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表 4 工具变量法和 PSM-DID 检验结果

变量	Panel A:工具变量法		Panel B:PSM-DID 检验		
	第一阶段 公共数据开放	第二阶段 高质量发展	近邻匹配 高质量发展	核密度 高质量发展	半径匹配 高质量发展
工具变量	0.342*** (0.005)				
公共数据开放'	0.697*** (0.232)				
公共数据开放	0.352* (0.190) 0.570*** (0.156) 0.416*** (0.158)				
K-P rk Wald F 统计量	2735.962				
K-P rk LM 统计量	651.007***				
样本量	12 855	12 855	8 356	12 509	15 071
R ²	0.849	0.056	0.777	0.740	0.721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和企业及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3. 稳健性检验

(1)控制相关政策影响。为缓解样本期内其他相关政策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参考方锦程等(2023)^[13]的做法,在基准模型中依次引入“信息惠民试点城市”(ZC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ZC2)、“智慧城市”(ZC3)、“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ZC4)、“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ZC5)、“互联网+政务服务”(ZC6)政策虚拟变量,检验结果见表5,“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5 控制相关政策影响检验结果

变量	高质量发展						
<i>DID</i>	0.315** (0.149)	0.400*** (0.152)	0.435*** (0.154)	0.387** (0.151)	0.465*** (0.154)	0.362** (0.152)	0.343** (0.149)
<i>ZC1</i>	0.352 (0.225)						0.135 (0.212)
<i>ZC2</i>		0.264 (0.208)					-0.048 (0.209)
<i>ZC3</i>			-0.388 (0.240)				-0.149 (0.243)
<i>ZC4</i>				0.283 (0.179)			0.159 (0.182)
<i>ZC5</i>					-0.202 (0.197)		-0.432** (0.181)
<i>ZC6</i>						0.355 (0.221)	0.164 (0.236)
样本量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R ²	0.724	0.717	0.721	0.716	0.717	0.719	0.723

(2)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彭远怀(2023)^[12]的研究,分别采用LP法和OP法计算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其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检验。第二,增加固定效应。考虑到行业异质性可能对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分别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和行业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重新进行检验。第三,删除特殊样本。为排除2015年股市波动、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分别剔除2015年样本、2020年样本以及2020年以后样本,重新进行检验。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均支持基准回归的结论。

表6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增加固定效应		剔除2015年	剔除2020年	2010—2019年
	TFP_LP	TFP_OP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
<i>DID</i>	0.037 ** (0.018)	0.035 ** (0.017)	0.461 *** (0.098)	0.477 *** (0.098)	0.419 *** (0.153)	0.432 *** (0.158)	0.654 *** (0.168)
行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行业×年份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16 264	16 264	16 264	16 264	15 255	14 112	9 040
<i>R</i> ²	0.893	0.849	0.721	0.727	0.717	0.714	0.746

4. 机制检验

本文参考江艇(2022)^[43]提出的机制检验方法,构建机制检验模型如式(2)所示:

$$M_{it} = \beta_0 + \beta_1 DID_{it} + \gamma Controls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M 代表机制变量,其他变量同式(1)。根据理论分析,选取以下机制变量:第一,“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和“供应链效率”。借鉴巫强和姚雨秀(2023)^[25]、Liao和Zhou(2025)^[23]的研究,采用供应链集中度的负值衡量供应链配置多元化,使用 $\ln(365/\text{库存周转率})$ 的负值衡量供应链效率,其中供应链集中度为企业当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与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的均值。第二,“动态能力”。参考杨林等(2020)^[30]的研究,基于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3个维度综合测量企业的动态能力。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7,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供应链配置的多元化、提升了国有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动态能力。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显著。由此,假说H2和H3得到验证,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优化供应链和增强动态能力的传导机制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表7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供应链配置多元化	供应链效率	动态能力
公共数据开放	1.157 *** (0.444)	1.001 *** (0.032)	0.026 *** (0.007)
样本量	15 091	16 045	9 098
<i>R</i> ²	0.755	0.857	0.803
Sobel 检验 <i>z</i> 值	3.188 ***	3.933 ***	2.677 ***
Bootstrap 检验置信区间	[0.007, 0.034]	[0.014, 0.041]	[0.005, 0.042]

5. 异质性分析

(1) 政府数据开放质量异质性。考虑到不同城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水平与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很可能产生政策效应的差异,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开放数林指数”,对样本期内各处理组城市该指数的平均得分进行排序,将排名前 50 的处理组样本划归数据开放“质量较高”组,其余处理组样本划归“质量较低”组,并分别与控制组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A。在两组样本中,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均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但“质量较高”组的系数显著性和绝对值均大于“质量较低”组,且系数差异显著(经 1 000 次 Fisher 置换检验, P 值小于 0.001),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质量的提升能够增强其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2) 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参考吴非等(2021)^[44]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算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以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和“水平较低”两组,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B。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国有企业自身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较强,对公共数据的需求相对较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其数据资源改善的赋能作用相对有限;而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较弱,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有效打破其信息壁垒,缓解其信息不对称,进而通过数据赋能有效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3) 市场竞争异质性。基于主营业务收入计算样本企业注册地的赫芬达尔指数,以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市场“竞争较大”和“竞争较小”两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C。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市场竞争较大地区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对市场竞争较小地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当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国有企业发展压力较大,对公共数据的需求更为迫切,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公共数据提升发展质量,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显著优势;而当市场竞争较小时,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且受制于路径依赖而忽视数据驱动的转型升级,对数据要素的利用不充分,导致公共数据等外部数据资源对其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较弱。

(4) 地理区位异质性。依据企业注册地所在地区,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组,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D。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数据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较高,且市场竞争较激烈,加之国有企业获取和整合公共数据的能力较强,促使国有企业能够充分地利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数据赋能效应来加快高质量发展;而中西部地区数据基础设施较薄弱,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有待提升,加之国有企业数字技术积累欠缺制约了其对公共数据价值的挖掘与激活,导致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Panel A:数据开放质量		Panel B:企业数字化转型		Panel C:市场竞争程度		Panel D:地理区位	
	质量较高	质量较低	水平较高	水平较低	竞争较大	竞争较小	东部	中西部
公共数据开放	0.643*** (0.191)	0.504* (0.260)	0.018 (0.209)	0.738*** (0.196)	0.630*** (0.227)	0.267 (0.209)	0.555*** (0.195)	0.238 (0.254)
样本量	11 744	7 364	8 389	7 685	8 334	7 811	10 483	5 781
R^2	0.729	0.697	0.765	0.735	0.739	0.757	0.721	0.716

五、结论与启示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有为政府应在数据资源供给与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公共数据开放为代表的政府数字治理正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关注不足。本文以城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2010—2024年的数据,从经济效益、社会责任、战略使命三个维度测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第一,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承担战略使命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第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促进国有企业以供应链优化为代表的“外部协同”(具体表现为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和供应链效率提升)和以增强动态能力为代表的“内部提升”,进而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三,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质量的提升能够增强其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市场竞争较大地区、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市场竞争较小地区、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积极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并持续提升数据开放质量。各地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公共数据资源的高质量、针对性供给,不断扩大公共数据开放范围,并拓展产业链供应链相关数据应用场景:设立产业链供应链数据专区,整合物流、市场、产业、信用等相关数据资源,提高数据资源的针对性和可获取性,为企业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提供数据支撑;支持国有企业牵头开展公共数据应用创新,通过举办公共数据应用创新大赛、推动数据应用场景开发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创新数据管理与应用模式,推动公共数据在供应链优化、产业协同和资源配置中的深度应用。

第二,因地制宜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在推进公共数据开放过程中,应结合区域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数据赋能政策。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相对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应依托国有企业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优势,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治理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与本地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数据资源开放,优化区域数据要素供给环境。在东部地区,应依托国有企业较为完善的数字化基础和产业体系,进一步探索开放高价值动态公共数据资源,并建立跨区域数据共享与协同机制,发挥中央企业跨区域资源配置优势,推动算力资源与数据产品互联互通,缩小区域数字鸿沟。

第三,完善国有企业数据治理体系,提升数据驱动发展能力。国有企业应充分认识公共数据资源和企业数据资产的战略价值,加快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建设。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内部数据资源整合与规范管理,推动内部数据资源与公共数据资源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应将数字化转型与治理结构优化相结合,并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数据应用创新,持续提升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积极推动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何瑛,梁湘钊. 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逻辑、经验范式与实践路径[J]. 经济管理, 2024, 46(4): 5-28.
- [2] 何威风,刘巍. Eva 业绩评价与企业风险承担[J]. 中国软科学, 2017(6): 99-116.
- [3]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 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 19-41.

- [4] 肖红军. 面向“十四五”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 经济体制改革, 2020 (5): 22-29.
- [5] 陈艳利, 戚乃媛.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资本配置的视角[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 44 (5): 124-144.
- [6] 马新啸, 黄晓珊, 王心蕊. 产权权利束分割与国有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企业“脱虚返实”的微观视角[J]. 财贸经济, 2025, 46 (2): 141-158.
- [7] 吴秋生, 郑玥臻. 高管限薪方式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 经济问题, 2025 (1): 70-78.
- [8] 陈西婵, 陈艳, 罗正英, 等. 营商环境、研发补贴与国有企业实质性创新[J]. 科研管理, 2024, 45 (2): 155-164.
- [9] 杨兴全, 刘颖, 张可欣. 产业链“链长制”与国企聚焦主业: “助推器”抑或“绊脚石”[J]. 会计研究, 2025 (5): 147-160.
- [10] 王建新, 廖志超. 媒体关注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内部控制的路径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 (3): 55-64.
- [11] 杨壮, 吴福象, 龚恩泽. 公共数据开放能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吗——基于政府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经纬, 2025, 42 (4): 3-15.
- [12] 彭远怀.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创造作用: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 (9): 50-70.
- [13] 方锦程, 刘颖, 高昊宇, 等.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管理世界, 2023, 39 (9): 124-142.
- [14] 郭家堂. 公共数据开放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据要素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5, 60 (2): 56-72.
- [15] 马永军, 黄睿轩. 公共数据开放何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宏观质量研究, 2024, 12 (4): 57-71.
- [16] 胡海洋. 数据要素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共数据开放的经验证据[J]. 企业经济, 2025, 44 (6): 62-72.
- [17] 李恩极, 谢康, 李晶.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25, 44 (12): 69-78.
- [18] 刘艳, 彭燕, 张晨. 公共数据开放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来自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OL]. 当代经济, 1-15 (2026-06-05). <https://link.cnki.net/urlid/42.1430.f.20260604.1042.014>.
- [19] 王生年, 侯丹阳.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否助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基于企业跨地区采购的经验证据[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5 (7): 56-76.
- [20] 叶永卫, 余田田, 陶云清, 等. 政府数据要素共享的稳投资效应: 来自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5, 42 (1): 136-156.
- [21] 黄先海, 虞柳明, 戴岭. 政府数据开放与创新驱动: 内涵、机制及实践路径[J]. 东南学术, 2023 (2): 102-113, 246.
- [22] Zhao J. The effect of data sharing on supply chain risk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China's public data open platforms[J].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25, 18 (4): 100444.
- [23] Liao W, Zhuo L.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corporate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a local government data openness platform[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5, 87: 1557-1574.
- [24] 曾增, 唐松. 新冠疫情下国有企业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基于供应链扶持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3, 58 (3): 78-96.
- [25] 巫强, 姚雨秀.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 集中化还是多元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8): 99-117.
- [26] 李晓梅, 刘姗姗. 数据要素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5, 42 (5): 1-11.
- [27] 陶锋, 王欣然, 徐扬, 等.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5): 118-136.

- [28] 张倩肖,段义学. 数字赋能、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管理, 2023, 45 (4): 5-21.
- [29] 董保宝,葛宝山,王侃. 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 机理与路径[J]. 管理世界, 2011 (3): 92-101.
- [30] 杨林,和欣,顾红芳. 高管团队经验、动态能力与企业战略突变: 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 2020, 36 (6): 168-188, 201, 252.
- [31] 谢佳松,樊嘉诚,林建浩. 信息摩擦、公共数据与企业创新边界[J]. 经济研究, 2025, 60 (11): 51-73.
- [32] 焦豪,杨季枫,王培暖,等. 数据驱动的企业动态能力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11): 174-192.
- [33] 邵云飞,陈燕萍,吴晓波,等. 从“研发”到“市场”: 链主企业如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商业化? [J]. 管理世界, 2024, 40 (12): 19-43.
- [34] 邢小强,汤新慧,王珏,等. 数字平台履责与共享价值创造——基于字节跳动扶贫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1, 37 (12): 152-176.
- [35] 范玉仙,张占军. 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当代经济研究, 2021 (3): 71-81, 112.
- [36] 胡海峰,白宗航,王爱萍. 供应链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4 (9): 137-155.
- [37] 石大千,胡可,陈佳. 城市文明是否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与交易成本视角[J]. 产业经济研究, 2019 (6): 27-38.
- [38] 张涛.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及测度方法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 (5): 23-43.
- [39] 王瑶,黄贤环.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 (12): 182-184.
- [40] 田丹,丁宝.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组织韧性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3 (9): 154-170.
- [41] 王锋正,刘曦萌. 智能制造政策、知识重构与供应链韧性[J]. 经济管理, 2025, 47 (4): 154-170.
- [42] 肖土盛,孙瑞琦,袁淳,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劳动收入份额[J]. 管理世界, 2022, 38 (12): 220-237.
- [43]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5): 100-120.
- [44]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 (7): 130-144, 10.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U Haichen, LI Chenyue, ZHAO Ruitong, LIN Qiao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Xinjiang, China)

Summar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data elements continues to advance,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data resource supply and alloc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supply represented by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is gradually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influenc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s pilla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re central to deepening SOE reform and promoting overall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how this universally accessibl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affec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ous boundary conditions remain to b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aking the launch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 platforms in various region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selects A-share listed SOEs from 2010 to 2024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employ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approach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Es. To mea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SOE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system is grounded in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SOEs and consists of three dimensions: economic perform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ategic miss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Es,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driv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Es through a dual pathway of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internal capability enhancement”: externally, it improves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and promotes supply chain configuration diversification; internally, it strengthens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SOEs.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is higher, when SOEs have strong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ategic mission orientation, and when enterprises are located in eastern regions, operate in more competitive markets, or are at a relatively lower lev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pared with existing studi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by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its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Es. Second, based on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SOEs, i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tegrat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ategic mission, enrich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ology for SO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rd, it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internal capability”, systematically identifying the action pathways and heterogeneous boundary conditions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affects SO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related research.

To some ext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rinsic logic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affec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one hand,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optimize public data openness policies and deepe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data el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t 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how to leverage public data, optimize their operational and development models, enhanc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 data platform;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supply chain configuration; dynamic capabilit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L32, O38, O32, G38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6)04-0071-16

(编辑:朱 艳;刘仁芳)